

# 外国新闻界人物（八）

王泰玄 编写

## 身残志坚的马里亚特吉

何塞·卡洛斯·马里亚特吉（Jose' Calos Maria tegui）是秘鲁著名思想家、工人运动领袖和新闻工作者。他把他短暂的一生献给了印第安美洲的社会主义事业，为在秘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开展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1895年6月14日，马里亚特吉出生在利马一个衰落的中产阶级家庭，父亲是财政法庭的官员。他7岁时在瓦乔上学时因膝盖受伤，一条腿严重丧失机能，成了跛脚。他因迫于生活，14岁进利马《新闻报》当学徒，给作家、记者传送稿件。他抓紧时间，勤奋自学，并开始在该报发表小文章。他的奋发顽强的精神和出众的才华，博得了社长唐阿尔维托·乌略亚的青睐，17岁当上了编辑。敏锐的洞察力，流畅的文笔，使他撰写的政治短评和新闻报道受到了欢迎。后来当《新闻报》变得右倾时，马里亚特吉便转到进步的《时代报》工作。他曾用“胡安·克罗尼克乌尔”的笔名发表文学作品。

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，使全世界被压迫、被剥削的人民看到了解放的希望。在新思潮影响下，马里亚特吉由爱好文学转向关心社会问题。1918年，他同塞费尔·法尔孔、费利克斯·巴尔德列等青年作者一起创办了一份刊物《我们的时代》。马里亚特吉在该刊第一期发表了题为《恶劣的倾向：军队的责任与政府的责任》一文，批评了政府的军备政策，希望发展生产和教育事业，终于遭到了军人的袭击。

1919年，马里亚特吉又办起了一家新的报纸《理性报》。这一年大饥荒的阴影笼罩着秘鲁，群众斗争的浪潮汹涌澎湃。5月1日，游行示威群众与军警冲突。5月27日秘鲁第一次全国大罢工爆发。马里亚特吉的《理性报》言正词严地支持了这场斗争，为降低物价，提高工人工资大声疾呼；同时主张教育改革，声援圣马科斯大学的学生运动。结果，代表秘鲁资产阶级地主集团利益的莱吉亚政府封闭了《理性报》，并以派送“学习”为名，变相地把马里亚特吉流放到欧洲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正处于革命高涨时期。马里亚特吉在旅欧四年之中，先后到过意大利、法国、德国和奥地利。在那里，他一方面目睹了工人英勇无畏的斗争，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威胁。同时，他结识了一批欧洲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。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的作品，使他感到无限亲切。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《资本论》、《哲学的贫困》、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》、《国家与革命》等著作。欧洲之行是他成长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，使他思想发生了一次飞跃。他看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，树立了社会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。

1923年，马里亚特吉刚一回国，便应邀前往冈萨雷斯普拉达人民大学讲演，系统地介绍了世界的变化和欧洲发生的重大事件。他在这次题为《世界危机和秘鲁无产阶级》的演讲

中说：“在当代这场大危机中，无产阶级不是旁观者，而是行动者。在这场危机中将要决定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”；无产阶级的文明，社会主义的文明“必将取代没落、腐朽、垂死的资本主义的、利己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文明”。包括这次在内的这一时期的一些讲演，后来收入1925年出版的《当代舞台》一书。他还为《万象》杂志的《世界舞台上的人物与状况》撰写了很多文章，内容广泛，不仅介绍了俄国革命、知识分子的革命运动、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，而且评析了托尔斯泰、卢那察尔斯基、高尔基、甘地、泰戈尔和墨索里尼等人物。

1924年，马利亚特吉腿疾加剧，截去一肢。不幸并没有使他悲观，他决心继续投身新闻出版事业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。经过一番计划和准备，克服了种种困难，他于1926年创办了著名的《阿毛塔》杂志。“阿毛塔”在印加语中是伟大学者和导师的意思。作为总编辑的马利亚特吉，亲自在创刊上撰写了题为《介绍阿毛塔》的文章，阐明该刊的宗旨“是用理论和科学观点来提出、说明和研究秘鲁的问题。但我们将永远在世界的范围内来考察秘鲁。”为它撰稿的作者有秘鲁思想家阿亚·德拉托雷·德拉托雷、路易斯·阿尔维托·桑切斯，作家和诗人塞萨尔·巴列霍、何塞·马利亚·埃古林等。刊物除登载马克思、列宁、斯大林著作外，还刊登了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普列汉诺夫，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罗莎·卢森堡，意大利革命者陶里亚蒂，俄国作家高尔基，墨西哥作家马利亚诺·阿苏埃拉，智利诗人聂鲁达等人的作品。另外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，关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，也是该刊经常涉及的题材。秘鲁政府把这家传播马克思主义、维护工农利益的刊物视作眼中钉，曾一变将其取缔，并拘禁了马利亚特吉。他在获释后，除继续出版《阿毛塔》外，又创办了一家完全为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服务的杂志《劳动》。后者明确支持莫洛科查矿区的工人斗争，以后它也受到当局查禁。

1928年，他的代表作《关于秘鲁现实七篇论文》问世。这是他努力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用于秘鲁实践，对本国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、研究的结果。全书包括七个篇章，其中尤以《经济演变概况》、《印第安人问题》和《土地问题》三章最为重要。《关于秘鲁现实的七篇论文》所作的分析，切中秘鲁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要害，对秘鲁，甚至对整个拉丁美洲都具有指导意义。此书已成为认识和研究秘鲁及拉美问题的经典著作，为人们广泛参考和引用。马利亚特吉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《捍卫马克思主义》。该书驳斥了当时的机会主义观点，表现了他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、维护十月革命的坚定立场。

马利亚特吉还以极大的精力，从事筹建秘鲁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。早在旅欧归来，他便为在秘鲁建立共产党从思想和组织上作准备。几年间，他在工会俱乐部、《阿毛塔》编辑部以至自己家里，经常与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和革命知识分子密切联系，逐渐形成一个革命核心。1926年，他参加了“美洲人民革命联盟”。1928年9月，马利亚特吉与另外七位同志创建了社会党（1930年在他逝世后改名为共产党），他当选为总书记。

马利亚特吉自截肢后，一直在轮椅中顽强地工作。繁重的任务和清贫的生活，使他的体质日益衰弱，以致旧病复发，于1930年4月16日逝世，年仅35岁。

## “英国报业之父”笛福

提起英国的丹尼尔·笛福（Daniel Defoe），人们往往较多地想到他是创作《鲁滨孙飘

流记》(The Life and Strang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n Crmsoe) 的小说家。其实,在历史上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闻工作者。他除写小说外写过许多报刊文章和政论作品;还亲自办过杂志,同一系列报刊有密切的联系,被人称作“英国新闻事业之父”(The father of the EngLish Journalism)。<sup>[1]</sup>

笛福原来的姓名叫丹尼尔·福,据说是受了虚荣心的驱使,在1703年后才将他的姓由福(Foe)改为笛福(Defoe)——加上法文的接头语“笛”(De),成为一个贵族的姓氏。

笛福于1660年出生于伦敦克里普尔盖特教区的一个油烛商家庭。他自小兴趣广泛,除从清教徒父亲处受到宗教信仰和经商的教育外,还接触了天文、地理、历史以及科学等各方面知识。1674年至1679年,他就读于查尔斯·莫顿主持的纽伊顿学校。在这里,他听过《天路历程》的作者约翰·班扬(1628—1688)雄辩而生动的讲演,而学识渊博的莫顿牧师的文风则成了他努力模仿的榜样。待到19岁从这所学校毕业时,他已练就了一种清晰而简练的文笔,为他日后从事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奠定了良好的文字基础。

由于出身低微以及在宗教信仰上受到当局的歧视,笛福此后未能进入有名的大学,而于1683年开始经商。他先后经营过袜子、内衣、烟酒、羊毛织品、制砖和航海保险等生意。频繁的商业活动,使他足迹及英伦三岛,并几番去欧洲大陆,相继到过西班牙、德国、法国和意大利。他的几部内容翔实、描写生动的国内外游记,如《新环球游记》(1724)、《不列颠全岛游记》(1724—1727),其中的材料是同他这个时期的经历和积累密切相关的。

笛福恰好是在蒙克将军迎立查理二世为王、斯图亚特王朝复辟那年降生的。此后英国内部各种矛盾错综交织,政局在很长时期里处于动荡与变化之中。1685年,作为新教徒的笛福,参加了蒙默士公爵反对天主教国王詹姆斯二世的叛乱。1688年,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借用荷兰执政奥兰治的威廉的军队发动政变。11月,威廉率大军在英国登陆,笛福参加了他的军队。

“光荣革命”后,笛福继续经商。1692年,他因经手保险的高船在英法战争中受损失而破产,负债达17,000镑,多年努力也未能全部还清。他为了谋生,做过政府秘密情报员,设计各种开发事业,同时积极从事写作。

1698年,他发表了《计划论》。在这一政论作品中,他批评了政府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的税收政策,主张切实地按照财产多少征税,此外他还就教育部门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意见。在《计划论》之后两天出版的小册子《穷人的呼吁》中,笛福认为执法者对穷人不公正,指出新贵族、乡绅、治安官等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人,却还要“治人”。在政治权利问题上,笛福接受了洛克(1632—1704)等保护资产阶级的“人权”思想。1701年,为了抗议托利党占多数的下院非法扣押肯特郡的请愿代表,他写了致下院的《备忘录》。1702年笛福又写了《论英国人民集体的原始权利》。笛福在这两篇文章中,强调了“人民”的权利。他说,“英国人民既不是国王的,也不是议会的奴隶”;“人民是主人”,而下院议员是“人民的仆人”。如果他们违法或侵犯了“人民的自由”,人民有权处理,也有权用非常的办法制止专制。

新国王威廉三世是一个外国人,守旧势力以此进行反政府的斗争。笛福发表了讽刺诗《纯血统的英国人》(The True Born Englishman, 1701):

·纯血统的英国人——我才不相信这回事!

论字面是笑话、论实质是虚构。

笛福认为英国民族由不同的民族混合而成，并不存在“纯血统的英国人”。笛福抨击英国贵族氏族的世系，说最少他们极大部分不属英国血统，而是以诺曼人、法国人、苏格兰人等为基础。美德不在于血统，不表现在承袭的封号，而是体现在完成了于社会有益事业的普通人们身上。<sup>[4]</sup>笛福驳斥了反对“外族”国王的种族偏见，为外籍的信奉新教的威廉辩护。他的作品受到了欢迎，连印了九版。他本人也受到了威廉三世的赏识。

但是好景不长。第二年，即1702年3月，热衷于国教的安妮女王在威廉三世死后即位，取消了资产阶级革命所取得的某些成果，包括政府对国民的宗教信仰不加干涉的规定。托利党占多数的下院通过了压制非国教会教徒的法案。1702年，笛福发表题为《消灭不同教派的捷径》(The Shortest Way With the Dissenters)<sup>[5]</sup>的政论，以讽刺手法，反对托利党人对非国教信徒的迫害。该文假托正统教会的一个代表人物所写，提议把不拥护国教的人统统绞死。起先，当局和国教会人士竟以为该文是他们拥护者的作品，甚为高兴。但是其中较有头脑者很快醒悟过来，看出了作品的真正用意。1703年1月，担任国务秘书的诺丁汉伯爵下令逮捕笛福，将他交付法庭审讯。笛福遭到了罚金和枷号示众三天的惩处。

1703年7月29日至31日，笛福在伦敦闹市临时搭起的高台上带枷市众时，一个异乎寻常的情况出现了：围观的人群非但没有像通常那样，对头和手被套在木架上的受刑者叫骂或投掷东西，反而向笛福欢呼，为他祝酒，把鲜花撒在他身上，给他带上花冠。同时他前几天在狱中写成的《立枷颂》(Hymn to the pillory)<sup>[6]</sup>也在这时出版，当街出售。这篇仿希腊诗人品达罗斯的歌颂体的作品，讽刺法律不公，指出应受刑的不是像他笛福那样的人，而是无能的将军、争权的政客、贪婪的财政家、邪恶的市政官、压榨穷人的地主，等等。不过，尽管法律今天保护了他们，但在将来他们失势时，总要受到惩处。《立枷颂》问世后，传诵一时，笛福也几乎被人当成英雄。

笛福在监狱中就考虑创办一种政治性的杂志。由于政府禁止报刊讨论国内的政治事件，他把新出版的杂志定名为《法兰西和全欧事务评论》(The Review of the Affairs)。该刊于1704年2月19日出版第一期，每期八版。最初为周刊，后改为周二刊，第二年又改为周三刊，同时又将刊名简缩为《评论》(The Review)。每一期《评论》都刊载有政治、商业和社会问题的文章，还不时地有副刊。笛福集编辑、作者与出版人于一身，杂志上的评论和报道，全出之于一个人的手之笔。该刊涉及的范围当然超出了“国外事件”的内容，其中有关社会政治问题的文章，对英国社会舆论有很大影响。笛福在办刊物过程中，不仅在内容上注意为大众所关心的题材，而且还在写作上考虑到通俗化和趣味性。他曾说：“假使有人问我认为什么是完美的风格或语言，我的回答就是：这种语言（一个人）用来跟五百个各式各样中等才能的人（白痴和疯子除外）讲话而为他们全体所了解，而且所了解的意义正合说话人希望表达的意义。”笛福惨淡经营《评论》杂志达9年之久（有中断），至1713年方停刊。

笛福一生编辑或为之写过稿的报刊很多。据统计，除《评论》外，尚有《爱丁堡新闻》(Eding burg Courant)、《苏格兰邮递员报》(Scots Postman)、《政治新闻》(Mer Curius Politics)、《米氏新闻周刊》(Mist's Weekly Journal)、《每日邮报》(Daily Post)和《白厅晚邮报》(White hall Evening Post)等25家报刊。据法国皮埃尔·阿尔

# 埃莉诺·罗斯福——

## 第一夫人和广播事业的先驱

[美] 莫思·毕思雷等

赵红 译

在人们心目中，埃莉诺·罗斯福不愧为本世纪最杰出女人。她是人道主义者，政治家，社会改革家，演说家和新闻记者。同时，她还是一位拿薪电台播音员，这一点，几乎被所有的人忽视了。本文将尽力描述她作为第一夫人时的电台生涯，如实记录她对发展商业性广播所做的贡献，以求补上历史空白。但由于她后来成为联邦众议员之后，广播的性质发生了变化，我们只能对她白宫年代（1933—1945）的电台工作，做一些浮浅的研究。

罗斯福夫人并不是第一位女播音员，而是这一领域第一位重要的女人。三十年代，尽管许多妇女进入广播领域，但她们大多数只能主持一些与家务有关的节目。罗斯福夫人被编在一个精选的小组中，大约有六人，包括玛莎·克兰、丽·玛格丽特·麦布来德、弗洛伦丝·柯里、凯瑟琳·克恩和外国记者多萝西·汤普森。她们分别主持一些城市和地区的节目，播发消息评论和人们感兴趣的内容。

罗斯福夫人不是第一位在电台播音的总统夫人。卢·亨利·胡佛夫人在她之前曾在电台向青年发表讲话。但她出面很少，也不带广告性，这与罗斯福夫人频繁的、冗长的广告性播音形成鲜明对照。作为第一夫人，埃莉诺·罗斯福以自己的知名扩大了广播的概念，并为创立集名人与电台记者于一身的角色树立之先型。

历史学家丹尼尔·丁·布斯汀在他的《印象》一书中，把名人称为“以知名而知名的人”

贝和费尔南·泰鲁合著的《世界影闻简史》介绍，笛福的长篇小说《鲁滨孙漂流记》，就是1719年在《每日邮报》上发表的，并称“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在报纸上发表的连载小说”。一位德国评论家则称之为“世界性的书”。

1713年，笛福就王位继承问题撰写了一些文章，结果以侮蔑宫廷入狱。他在以后14年里，因诽谤罪又先后四次被捕，常常是坐牢、罚款和带枷示众。甚至他还遭到当局这样的警告：如继续再犯，将予以吊死、分屍惩处。不过笛福在18世纪初的相当一段时间里，也接受过政府大量津贴。此外，他还充当了大臣哈利及其继任者戈尔多芬的秘密情报员。往来于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，为之搜集舆情，为苏格兰归并英国作准备工作。在参加政治生活期间，他时而依附托利党，有时依附辉格党，但政治活动的经验使笛福懂得这两个党派之间的纷争，“不管在那一党方面说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是那个党执政或是改组政府，都不过是伪装、装模作样和丑恶的虚伪而已”。

1719年，笛福根据一些航海家流亡者的记载，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小说《鲁滨孙漂流记》，获得了出乎意外的成功，到同年8月就已印刷了四次。该书的成功鼓舞笛福写作《鲁滨孙漂流记》的第二卷，即《鲁滨孙历险记》（1702年出版，描写商人鲁滨孙游历非洲、印度，经

而非出于“伟大的品行”。他认为,20世纪无所不在的广播工具,成为名人大量产生的媒介。同样,罗斯福夫人对电台发起人的吸引力,主要在于如是个名人。虽然如此,在她主持的节目中,她还是以普通评论员的身份,对现代生活发表看法,她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妇女,她尽各种努力帮助她们冲破家庭局限,打开眼界。也许是第一夫人的身份在做怪吧,节目总带着一种明显的政治调子。

举例来说,在她丈夫当选总统几星期之后,她主持了一套12集系列节目。节目由一位名叫旁斯的冷霜制造商资助,主要内容讲幼儿抚育和家庭关系。节目在1932年11月9日到1933年2月24日之间播出,正值总统就职典礼之前。在一次节目中,她提到了禁酒问题,鼓励妇女们学着饮酒,“适量地喝些威士忌或者金酒”。明显的讽刺语气,惹怒了禁酒主义者挑起了几场纷乱。

报纸针对旁斯节目,发表文章,指责这位未来的第一夫人将自己的名位商品化,她只得宣布不签订任何电台合同。她的私人密友、《合众报》记者洛瑞娜·A·希科克在一篇署名文章中写道,“入主白宫之后,罗斯福夫人将减少某些活动,并且引用她本人的话说,“我想我是犯了一些错误”。

1934年,也就是她丈夫就职典礼一年以后,她恢复了广告性广播。在一次没有文字记录的记者招待会上,她表示要不畏言论,努力挣钱。她认为自己为慈善事业挣钱是正当的。就这样,她先为一家屋面材料公司做广告,该公司付给她每分钟500美元,当时只有高薪电台明星才能拿这么多钱。接着,她又以同样酬报为西蒙床垫公司主持了5集节目,主要对每周重要新闻发表评论。

一位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听众写信给她,抱怨她的播音不值每六分钟拿3000美元。她回信同意这个观点,承认这些收入出自她的身份。“我想你是对的,没有人一分钟值这么大价钱,这钱不是付给我个人而是付给总统夫人的”。同时她也指出她至少值得其中的一部分。1933年5月,在给《读者文摘》一位编辑的信中,她写道:

由俄罗斯回到英国)。之后,又发表了《鲁滨孙沉思集》,与前两者构成一组三部曲。后两者较为逊色,因而鲜为人所知。以后他大致每年以一部的速度写了不少长篇小说,较著名的有《辛格顿船长》(Captain Singeleton, 1720)、《摩尔·佛兰德教》(Moll Flanders, 1722)、《大疫年记事》(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, 1722)、《罗克萨纳》(Roxana, 1724)和《一个骑士的回忆录》(Memoirs of a Cavalier)等。他还写过一些商业著作,如《经商全书》(1726)、《英国商业方略》(1728)、《使伦敦成为世界最繁荣都市之道》等。

笛福到晚年仍欠下大笔债款,不得不离家外逃,1731年4月24日凄然地死在异乡客地,最后归葬于伦敦的一个公墓。

① 哈罗德·赫德:《英国新闻事业史》,英国1952年版,第46页。

② (苏联)阿尼克斯特:《英国文学史纲》,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,第187页。

③ 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第二卷第573页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1985年版。

④ 哈罗德·赫德:《英国新闻事业史》,英国1952年版,第47页。